

# 北魏宋绍祖墓相关问题研究

□ 张志忠

2000年6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雁北师院扩建工地发掘了11座北魏墓葬。宋绍祖墓<sup>[1]</sup>是其中唯一有明确纪年和精美石椁的北魏早期墓葬。该墓由墓道、2个过洞、2个天井、甬道和墓室组成。第二过洞出土一块墓铭砖。阴刻“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柩”,墓室中部置一仿木构石椁。石椁内壁绘有精美壁画,周围随葬以牛车为中心的庞大出行仪仗,是大同地区继司马金龙墓<sup>[2]</sup>、方山永固陵<sup>[3]</sup>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从墓葬发掘至今,已发表了简报和数篇研究文章,但仍有诸多问题有待探讨。

## 一、石椁的定名

自古以来,墓就是用来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区的墓葬已用木棺作葬具。大汶口文化晚期,少数墓坑面积很大,坑内沿四壁用木材垒筑,上面用木板铺盖,构成了早期的木椁。商代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吏的墓,多用木材筑成椁室,敛尸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椁室正中。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所谓“天子棺槨九重、诸侯七重、大夫五重、士再重。”秦和西汉的棺椁制度沿袭了周代的礼制,仍有严格的等级限制。东汉以后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墓室内的葬具则有棺无椁。

棺作为装殓死者的器具,多为木制,大小大多以能够容纳死者为标准。石棺多仿照木棺,由底、盖、左右侧板和前后档六块石板装配而成。1976年山西榆社县河峪乡河洼村发现北魏纪年墓<sup>[4]</sup>雕刻画像石棺一具,形状为头大尾小的梯形。相近的北魏石棺,河南曾多次出土,1977年洛阳郭澧河乡上窑

村发现一具石棺<sup>[5]</sup>与以上形制相同。椁是棺外的套棺,形制比棺略大,形状多为长方体。

关于石室,据《魏书·高祖纪》记载:“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夏四月己亥(孝文帝)行幸方山。建永固石室于山上,立碑于石室之庭;又铭太皇太后终制于金册。”按《水经注·水》:“羊水又东注于如浑水,乱流逐方山西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东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隅雉列榭、阶、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矩,有若锦焉。”可见永固堂即永固石室,是臣子后人拜谒祭祀的场所。著名的洛阳北魏宁懋石室<sup>[6]</sup>结构为横长方形悬山式建筑,虽然葬入墓内,但只是作为祭奠用,并没有陈放死者尸骨。以上两种情况,石室不管是修筑于墓前、或埋入墓内,其功能不同棺和椁陈放死者尸骨,而是起着后人祭奠死者的作用。

宋绍祖墓为单构砖室墓,砖室实际上已经起了椁的作用。墓室中央置石椁,为仿木结构,三开间悬山顶,前廊后室屋宇形式。从形状看为石构的房子,石椁内的石棺床上未见木质葬具,人骨架因被盜扰散见于椁顶板及墓室内,从石棺床西部保存的两个石灰枕,说明死者是直接放在木椁内石棺床的盖板上。所以,此椁实际上起了棺的作用。其形状与同时期的石棺有明显的区别,形制和规模也大大地超过了当时的石棺。而且也不是作祭祀用,因而不能简单地定名为石室。按照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sup>[7]</sup>和太原隋虞弘墓<sup>[8]</sup>石椁的定名,从其形制和功能上考虑定名为石椁更为妥当。

## 二、石椁的壁画

石椁内部的东、西、北三壁均有绘画,但因潮湿和淤泥的长期腐蚀,石板表面沁出大量盐碱性结晶物质,致使壁画受到严重的剥蚀,漫漶不清。壁画直接绘于石椁内壁,采用墨线分界,作于四壁下部,技法是先用墨线勾勒出线条,再施红彩渲染。壁画内容西壁为一组舞蹈人物,东壁的已难以辨识,北壁正中是两位奏乐人物,皆着褒衣博带,头带方冠,面颊丰腴,神态怡然自得。西边的人物似席地而坐,手抚琴瑟;东边的人物左腿略伸,右腿微屈,手拨阮弦,侧身西望,似一边弹奏一边倾听美妙的琴声。整个画面纯熟地发挥了线条的表现能力,人物造型简练而传神(图一)。

两位奏乐人物弹奏的乐器分别为琴和阮,与南京一带南朝墓葬<sup>[9]</sup>中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砖画中的弹琴人物相似,应是当时南朝流行的高士形象。弹琴的为嵇康;“七贤”之首,是一个非常豁达而有文采的人物,文献中记载他“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且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当然,这里的“琵琶”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琵琶,而是一种被称为“阮”的弹拨乐器。相传这种乐器就是由阮咸发明,在许多地方剧种的演出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乐器。荣启期则是早于“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由于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砖画中安排荣启期和“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荣启期更有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虽然砖画中的荣启期同样手抚琴瑟,而且画面位置与阮咸相邻,但从时间顺序和人物性格分析,宋绍祖墓石椁壁画北壁正中的两位奏乐人物应为嵇康和阮咸更为合理,也有可能受到了



图一 大同雁北师院宋绍祖墓石椁壁画

南朝的影响。

宋绍祖墓石椁北壁,宽 2.39 米,正中的两位奏乐人物约占去三分之一,两侧有无壁画,由于淤土侵蚀已无法辨别,但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将竹林的七位贤士全部安排到画面是不可能的。以嵇康和阮咸代替“七贤”,代替南朝流行的高士形象,说明原来所具有的情节和人物个体的意义已经被淡化。竹林七贤画像题材南朝时期流行南方地区,后来影响到山东地区,宋绍祖墓石椁壁画发现的竹林七贤画像题材,说明该题材已影响到北方地区,就目前发掘材料看是北魏时期平城地区出现最早的。石椁周围出土的俑群与石椁壁画分别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域面貌,这是否说明墓葬装饰高士图像逐渐成为一种习俗。郑岩先生认为,除了七贤等形象作为名士所具有的魅力外,还应当有与丧葬观念密切相关的象征意义<sup>[10]</sup>。

## 三、墓葬的俑群

宋绍祖墓出土了大量陶质俑类,集中放置于石椁与墓室形成的环绕回廊中,虽然遭到一定程度的盗扰,但随葬陶俑的排列顺序和相互间位置并没有受到大的扰动,南部、西部随葬品放置稀疏且破损严重,东部和北部随葬品放置紧密、排列整齐。镇墓武士俑立于甬道和墓室南壁两侧,东边为头戴鸡冠形帽的骑马武士俑,步兵俑立于马前,间隔放置气派豪华的马车、牛车行列,两侧有胡人俑似呐喊或鼓吹为出行队伍助威,西边是人马皆着铠甲的甲骑具装,膘肥体壮的鞍马间于其中,造型敦厚的仪仗俑侍立于周围,组成完整的出行仪仗,按顺时针方向围绕墓室回廊一周,并向墓道方向前行。

综观各类陶俑均为写实造型,服饰采用垂裙皂帽,身着袴褶,与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同类陶俑如出一辙。出行场面的式样及各类人物的排列与朝鲜安岳发现的冬寿墓<sup>[11]</sup>浩大的出行图十分相似,该墓葬年代为东晋永和十三年(357年),出行场面和人物服饰反映了魏晋时期的式样和特点。2005年大同沙岭发现的北魏壁画墓<sup>[12]</sup>,据出土的漆片文字推测,墓主人为鲜卑人,死于北魏太延元年(435年)。墓室北壁绘有 100 多人组成的场面壮观、气势恢弘的出行队伍。前面是执纛的导骑、吹角的军乐,后面跟随扛幡持节的仪仗、手持长矛的侍卫,中央是高大华丽的车辆,车后有头戴鸡冠形帽的轻骑兵、甲骑具装的重骑兵、身穿铠甲的步兵和男女仆随从,自东而

西向墓道方向前进。无论是出行场景的人物排列还是人物装饰,都与宋绍祖墓俑群出行仪仗相一致,以上墓葬虽然采取了不同表现手法,壁画艺术或俑群排列,却反映了相同的丧葬题材内容。说明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行仪仗仍然延续了魏晋时期的式样,人物服饰却为鲜卑民族固有的垂裙皂帽、身着袴褶的传统风格,并把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结合在一起。古代墓葬中随葬的陶俑,是奴隶社会用人作为殉葬的模拟替代品,东周墓中开始流行,秦汉至隋唐时期更为盛行。与此同时,西汉晚期兴起在墓壁上装饰绘画艺术的壁画墓,东汉时期开始在各地广泛流行。但随葬陶俑的墓葬与壁画墓为互不交融的两个系统,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汉代、十六国和魏晋时期河西、辽阳地区的壁画墓,绘画反映了墓主人出行、生产、生活等场景以及希望死后升仙的心愿,可随葬品仅是一些日用器皿,不见与壁画人物相似的俑类。而洛阳魏晋时期的墓葬和大同北魏时期的一些墓葬,出土了大量反映墓主人生活的俑类,却不见类似的壁画内容。宋绍祖墓既有石椁壁画又出土大量陶俑组成的出行仪仗,从现在资料看是较早将二者相融合的实例。在此之后发现的洛阳北魏墓葬和河北、山西东魏北齐大型墓葬的壁画和陶俑多集中在同一座墓葬中出现。

此外,冬寿墓和沙岭北魏壁画墓均以一辆牛车为中心,周围是众星捧月的仪仗、兵马、侍卫和随从组成的浩大出行队伍。而宋绍祖墓陶俑出行队伍中,从前至后安排了6辆陶车模型,分4种车型,按照前导、传乘、副乘、主车的顺序依次排列,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车舆系列(关于北魏陶车模型另文专论),各种车型制作规整,各部分细节反映清晰,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行车辆的配置和车制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文集(三)》,2000年。

[5]河南博物馆《洛阳北魏画像馆》,《考古》1980年第3期。

[6]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

[7]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文物》2001年第7期。

[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隋代虞弘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

[9]南京博物院《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第8、9期。

[10]郑岩《南昌东晋漆的启示——论南北朝墓葬艺术高士图像的含义》,《考古》2002年第2期。

[11]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的》,《考古》1959年第1期。

[12]刘俊喜《山西大同沙岭发现北魏壁画墓》,《中国文物报》2006年2月24日。

[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

[2]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管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3]大同市博物馆《大同方山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4]王太明《榆社县发现一批石棺》,《山西省考古学会